

吐鲁番出土《千字文》残片考

张新朋

《千字文》是我国古代通行的童蒙识字课本之一,唐五代时期曾在我国敦煌吐鲁番地区广为流传,因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大量的《千字文》写卷及残片。敦煌文献中的《千字文》写本有140餘件之多,我们已汇集为专辑^①。吐鲁番文书中的《千字文》写卷,前人已经认定的有61件(国内藏34件、日本藏25件、德国藏1件、英国藏1件)^②。最近笔者又认定了12件,并就原已认定的若干件《千字文》残片进行了缀合。现条列如下,以就教于方家。

1. 64TAM27:51。残片,存残文两行,首尾及下部残,第1行存“列张□□□”五字,第2行存“□□”两字右部。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^③题作“文书残片”(第4册第177页)。今按此残片所抄内容出自《千字文》,原文相关文句作“日月盈昃,辰宿列张。寒来暑往,秋收冬藏。闰馀成岁,律吕调阳”(加下划线的文字为上揭残片所存,下同),当定作“《千字文》残片”。其中“张”下三字为“寒来暑”之残,第2行二字则是“岁律”之残。

2. 64TAM29:111/7(b)。残片,存“□字文 敕员”残文一行,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题作“文书残片”(第3册第359页)。今谓此片所存乃《千字文》首题“千字文”及题衔“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”之一部分,当定作“《千字文》残片”。

3. 72TAM179:17/1—17/4。该号有被剪作鞋底形的残片四片,前三片各存残字5行:第一片前4行书“荷”、“的”二字习字各两行,末行存某字右部残迹;第二片前4行存“戚”、“谢”二字习书各两行(“戚”字习书首行右部残),末行抄“欢”字(左部残);第三片首行书“欢”字(右部残),其后抄“招”、

①参看张涌泉主编《敦煌经部文献合集》(中华书局,2008年)之《千字文》部分(第8册,第3890—3996页)。

②参看唐长孺《跋吐鲁番所出〈千字文〉》(《唐研究》1995年第1期,第1—9页)、张娜丽《西域发见的佚文资料——〈大谷文书集成〉所收诸断片について》(《学苑》第742号,2002年,第26—52页)、王素《敦煌吐鲁番文献》(文物出版社,2002年)、陈国灿、刘安志主编《吐鲁番文书总目(日本收藏卷)》(武汉大学出版社,2005年)等论著。

③中国文物研究所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、武汉大学历史系编著,文物出版社,1996年。

“渠”二字各2行(末行“渠”字左部残缺);第四片存残文两行,第1行仅存文字右端,不可辨识,第2行存“□□日和闾利放书”(“日”字为武周新字)等字样。四片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题作“文书残片”(第3册第366页)。今按前三片所抄内容出自《千字文》,原文相关文句作“欣奏累遣,感谢欢招。渠荷的历,园莽抽条”,故当定作“《千字文》习字”。又依文本之顺序,第一片当位于第三片之后。第四片因所抄文本具体内容不存,无法判断是否为上揭《千字文》习字之后的题名,但其笔迹与前三片相同,则前三片《千字文》习字亦当出自“和闾利”之手。

4. 72TAM151:73。该号计有残片16片,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题作“文书残片”(第1册第118页)。其中第11片(右起横向计算,下同)存“被□……□”三字,第12片存“□食”二字。今按此二片皆《千字文》残片,前一片“被”下第一个字为“草”字之残;后一片第一个字为“赖”字之残。又第16片存已严重漫漶的文字,似“□□(被草)”二字,若所识不误,亦为《千字文》习字,然图版甚为模糊,暂且存疑。又上揭之《千字文》残片,当即同墓所出《千字文》习字残卷(72TAM151:68、72TAM151:70、72TAM151:69)(第1册第116-117页)之碎片,参看同墓所出残片“化被草木,赖及万方”、“白驹食场”句之“被”、“草”、“赖”、“食”等字。

5. 72TAM157:103-1、72TAM151:103-2。二号皆狭长形残片,首尾及上下皆残。72TAM157:103-1号由内容上衔接但不能直接相连的三个残片组成:第一片存习字5行,前4行抄“员、外”二字各两行,末行存某字右端残迹;第二片存“散骑”习字3行及末行某字之右端残迹;第三片所存最多,存“侍、郎、周、兴、嗣、次、韵、天、地”等字习字16行(“侍”字、“地”字习字存一行,其余各字皆存两行),另有抄写题记一行(位于第5行),存“六□三日温旧□”七字(第3册第552页)。72TAM157:103-2号由两片组成,第一片存“玄、黄、宇”习字各两行;第二片存残文22行。其中第6行为浓墨所涂,不可辨识,然从残片现存其他内容及抄写形式上看,此行所抄当是抄写题记之类的内容;第7行为抄写题记,仅存“□记”二字;余则抄“岁、律、吕、调、阳、云、腾、致、雨、露、结”等字(“岁”、“结”二字各存一行,余皆两行)(第3册第552页)。72TAM157:103-1、72TAM157:103-2二号,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皆题作“文书残片”,题解中进一步指明残片均为学童习字,但未具体定名(第3册第550页)。今据其内容可知,二号所抄皆出自《千字文》,所存为题衔“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”及正文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”、“闰馀成岁,律吕调阳。云腾致雨,露结为霜”之内容,以定作“《千字文》习字”为切当。二号抄写形制、书体均一致,无疑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又72TAM157:103-2之第一片所存与72TAM157:103-1号第三片所存在内容上恰好相连,二号或即同一写卷之裂。其中72TAM157:103-1号第三片与72TAM157:103-2之第一片间衔接处的“地”字习字仅存右端残迹;而72TAM157:103-2之第一片末字“宇”与同号

第二片首字“岁”之间,在不考虑文中抄写题记的前提下,据抄写体式判断则残缺“宙、洪、荒、日、月、盈、昃、辰、宿、列、张、寒、来、暑、往、秋、收、冬、藏、闰、馀、成”22字习字44行及“岁”字习字1行。

6. 73TAM518:21。残片,存习字18行,抄“名、立、刑、端、表、正、空、谷、之、传”等字。其中第1行仅存行首之“名”字,第15行“之”字抄一行(夹抄于两行“谷”字习字之间),此外各字皆抄两行。又第7行上部书有习字抄写的日期,存“六月十□(八)”等字样(第3册第471页)。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题作“文书残片”(第3册第471页)。今谓该片所抄除“之”字一行外,其余各行文字皆出自《千字文》,原文相关文句作“德建名立,形^①端表正。空谷传声,虚堂习听”,故以定作“《千字文》习字”为宜。第15行的“之”字盖抄手随意书之,《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》110号《千字文》习字、《开蒙要训》习字中亦杂有与文本无关的文字(第3册第45-51页),可以比勘。

7. 《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(非佛经部分)》^②(以下称《斯三考》)OR.8212/625背 Toy. II. i .02;01。该号计有残片3片,第1片存“□疲”习字二残行,第2片存“动”字一残行,第3片存“志”字一残行。《斯三考》题作“习字”(第1册第170页)。今按此三残片所抄为《千字文》,原文相关文句作“性静情逸,心动神疲。守真志满,逐物意移”,三片当定作“《千字文》习字”。第一片“疲”上之字当为“神”字。又据原文之次序第2片当位于第1片之前,二片内容上相连,但不能直接缀合;调整顺序后,“志”与“疲”字之间残“守”、“真”二字习字两行。如下图所示:



OR.8212625背 Toy. II. i .02;01《千字文》习字(左原图,右调整图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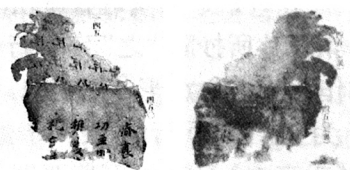
8. 大谷1451号。大谷1451号与1450号用线缝在一起(参看所附原图),其中1451号背存习字4残行,书“之”、“所”、“如”三字(第1册图版117),《大谷文书集成》^③(以下称《大谷文书》)释文云背面下部存“慎”、“美”习字,因笔者所见为复印件,这些文字无法辨识。该残片《大谷文书》题作“习字纸断片”(《释文》第61-62页),《吐鲁番文书总目(日本收藏卷)》题作“习字残片”(第48页)。今据正面所抄“之”、“所”、“如”并结合背面的“慎”、“美”等字判断,该号习字所书内容盖出自《千字文》,《千字文》有“似兰斯

①“形”,习字中作“刑”,二字古通用。

②沙知、吴芳思编著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5年。

③小田义久责任编集,法藏馆,1985、1990、2003年。

馨,如松之盛”、“笃初诚美,慎终宜令。荣业所基,籍甚无竟”之句,故当定作“《千字文》习字残片”。习字中“之”、“所”、“如”、“咏”等字前后失次,盖因抄写者随兴而书,未严格遵照《千字文》原文的顺序抄写而致。又大谷 1450 号背面下部存“如如咏”三字,今谓此三字亦为 1451 号正面《千字文》习字之一部分(《千字文》有“存以甘棠,去而益咏”之句),因卷子粘连而成为 1450 号背面之文字(参看下面右侧复原图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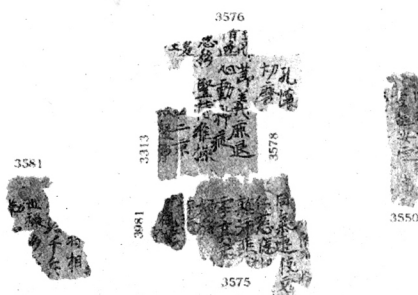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谷 1451+1450 原图(左正右背)



大谷 1451《千字文》习字局部复原图

9. 大谷 3550+3575+3576+3578+3313+3981+3581。上揭七残片俱载于《大谷文书》(貳),原书有定名,题作“千字文习字纸小片”或“千字文习字纸断片”;并于 3576、3578 号下指明二者为同一书体(详见该书各号释文),然未进一步探讨各片之间的关系(第 2 册图版 81、82,《释文》第 74、122、125-127、182 页)。今谓上揭七残片,书体甚近、行款一致(分上下两栏,行 12 字),当为一件之残,依文本内容及行款,予以缀合(如下左图所示)。其中 3575、3576、3578、3313、3981 五件可以缀合成前后相连的一片,而其与前部的 3550 及后部的 3581 两残片之间均有 4 行文字残缺。



大谷 3550+3575+3576+3578+3313+3981+3581《千字文》缀合图



大谷 3829+3573《千字文》缀合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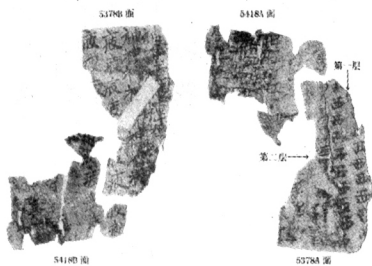
10. 大谷 3829+3573 号。大谷 3573 号《大谷文书》公布时已定名为“千字文习字纸断片”(第 2 册图版 81,《释文》第 125 页),大谷 3829 号公布时定名为“佛书断片”(第 2 册图版 73,《释文》第 159 页),后经张娜丽辨识,改订为《千字文》抄本残片^①,此后大家未进一步深究。今谓大谷 3829 号与大谷 3573 号二者实为同一写卷之裂,可以缀合,大谷 3573 号所存恰好为大谷 3829

^①张娜丽:《西域发见的佚文资料——〈大谷文书集成〉所收诸断片について》,《学苑》第 742 号,2002 年,第 34-36 页。

号第 7-10 行所缺之文字,衔接处密合无间(如右上图所示)。又《大谷文书》于 3573 号释文中云该号与 3575 号文书为“同笔”。今从笔迹上看,二者在某些笔画的运笔上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(参看 3575 号“连”字“辵”旁与 3573 号“建”字“辵”旁、3575 号“隐”与 3829 号“阴”所从之“阝”旁等),但并不完全一致。另外 3829+3573 号残片,行 16 字,与上揭 3550、3575、3578 等缀合而成的残片行 12 字的行款不合,且抄写形制不一(前者分上下两栏抄写,后者不分栏),应非同一写卷之裂。

11. 大谷 8102+4402。大谷 8102 号《大谷文书》公布时已定名为《千字文》(第 3 册图版 45,《释文》第 237 页),4402 号公布时拟题“性质不明文书”(第 2 册图版 94,《释文》第 248 页),后张娜丽定作《千字文》抄本残片^①,甚是,各家亦止步于此,未进一步考察。今谓二者书体甚近(参看 8102 号“牧”字与 4402 号“巖”字所含之“攴”、8102 号“𦣻”字与 4402 号“冥”字所从之“冫”及 8102 号“威”字与 4402 号“我”字之“戈”形构件等)、行款一致(行 8 字),实为同一写卷之裂,可以缀合。如此可知大谷 8102 号末行所存为“九州禹迹”之残迹,而大谷 4402 号首行乃“巨野洞庭”之残迹,中间仍有“百郡秦并。岳宗泰岱,禅主云亭。雁门紫塞,鸡田赤城。昆池碣石”等句残缺。

12. 大谷 5378+5418。二号《大谷文书》公布时定名为“千字文习字纸断片”(第 3 册图版 42,《释文》第 153、167 页),甚是。今谓二者字体一致、抄写形式大体相同、内容相接^②,当为同一写卷之裂,可以缀合(如下图所示),衔接处亦大体相合。又通过大谷 5378 号 A 面图版,我们可以看出,该习字纸是由两层纸粘合而成,自上而下抄写的“西”字与自下而上抄写的“有”、“东”二字^③处于不同的纸张层面。缀合后大谷 5418 号 A 面所存的“赤”、“地”习字亦逆行抄写,与“有”、“东”之习字在同一纸张层面。虽然《千字文》中也有“有”、“赤”、“地”等字出现,但他们与“西”字属于不同的纸张层面且抄写方向不一、先后次序紊乱,因此这些文字是否为《千字文》习字,尚需进一步考察。



大谷 5378+5418《千字文》习字缀合图(左 B 面,右 A 面)

①张娜丽:《西域发见の佚文资料——〈大谷文书集成〉所收诸断片について》,《学苑》第 742 号,2002 年,第 34-36 页。

②缀合后 A 面衔接处的文字虽不甚清晰,但仍可以看出为同一字的习字。

③此据《大谷文书》释文,图版中此二字的习字甚模糊。

又大谷 5377 号(第 3 册图版 43,《释文》第 153 页)与大谷 5378 号同为交河故城出土,书体较近,抄写形制亦大体相合(每字大抵连续抄写两行),或出自同一人之手。但依《千字文》文本判断,大谷 5377 号 A 面末字“调”与大谷 5418+5378 号 B 面^①首字“神”之间缺“阳、云、腾、致、雨、露、结、为、霜”等 359 字的习字,而大谷 5418+5378 号 A 面首字“西”与大谷 5377B 面首字“罗”之间,仅缺“二、京、背、芒、面、洛”等 75 字的习字,二者之间相差悬殊,故是否为同一写卷之裂,暂且存疑。

上掲诸《千字文》残片的认定及缀合具有如下意义:

(1)摸清了吐鲁番出土《千字文》家底,理清各残片之间的关系。本文所涉及的这些《千字文》残片的认定,使得吐鲁番本《千字文》在数量上增加了 12 件,总数达到了 73 件。残片的缀合则进一步理清了这些残片之间的关系,使得吐鲁番出土《千字文》抄本体系的脉络变得更清晰,为我们从宏观上考察吐鲁番本《千字文》创造了条件。

(2)推进吐鲁番文献总目的完善与编纂。目录是研究的基础,是学术发展的阶梯。目录对于数量巨大且收藏分散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而言,尤其重要。目前虽有《吐鲁番文书总目(日本收藏卷)》、《吐鲁番文书总目(欧美收藏卷)》等目录出版,但仍有不少的写卷被冠以“习字”、“性质不明文书”、“文书残片”等名称,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目录的指示作用。上掲各《千字文》残片的认定与缀合,可以推进吐鲁番文献总目及相关专题目录的完善与编纂。

(3)钻“故纸堆”与钻新技术相结合,促进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。本文涉及了几件前人已认定,但未能进一步深入研究缀合的《千字文》残片。前辈们没有深入的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,但这与前辈学者年龄较大,对于电脑技术不太熟悉不无关系。二十一世纪各项技术的突飞猛进,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提供了前辈学者们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,我们在继承前辈们严谨求实,一丝不苟,精益求精的优良治学传统的同时,也要发挥我们在接受新技术上的优势。这些《千字文》残片的进一步缀合,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,我们这些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后来者,既要钻“故纸堆”,又要钻新技术,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

^①《大谷文书》所定大谷 5377 号的正背面与大谷 5418、大谷 5378 号的正背面恰好相反,因不能确定大谷 5377 号与大谷 5418+5378 号是否为同一写卷之裂,故正背面的问题暂仍其旧,不予更改。